

自由时间、收入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徐俊武¹, 吴伟杰²

(1. 湖北大学 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 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福建 安溪 362400)

[摘要]在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家庭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个体收入,又要通过改革来增加自由时间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关键词]自由时间;收入分配;个体主观幸福感;公共支出;财政结构;社会保障;居民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6)02-0040-08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也逐渐陷入一种困顿:在物质财富大幅增长的同时,居民幸福感却没有得到同步增强。201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央视记者分赴全国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你幸福吗?”这个简单的问句引爆了全民对幸福的大讨论,也带来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发展与幸福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人民追求的生活目标又是什么?幸福感是大多数人的答案。与此同时,提升居民幸福感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政府领导人摆上施政纲领。

一、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从来不乏对幸福的关注。自从时间首次作为限制条件被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后,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除了消费与收入外,个人和家庭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们对于时间的支配自主权。时间和收入一样是稀缺资源,它对人们的幸福有着不容小觑的重要意义,劳动时间的节约将增加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保持生活和工作的有机平衡对于应对现代社会中繁重压力的人们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单纯考虑收入对于人们幸福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研究者不断引入中间变量,以探求这些变量对人们幸福的影响,这经历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早期的幸福研究者主要考察个体特征变量,如婚姻状况、性别、年龄、健康、教育程度和就业状态等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些年来,学者们开始将宏观经济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到幸福方程中,其中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被引入。也就是说,人类的福利不能只是依据其终极状况来判断,其选择过程以及选择的自由度也与福利紧密相关。基于此,Goodin等提出了时间自主权概念^[1],Burckhardt则进

[收稿日期]2015-12-05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014)

[作者简介]徐俊武(1978—),男,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吴伟杰(1992—),男,福建安溪人,安溪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职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福利经济学。

一步对“能力—自由”框架进行了扩展,用对时间的掌控程度和可支配收入来衡量个人实质自由^[2],该方法为研究时间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

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幸福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缓慢发展后,21 世纪初开始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一部分学者对国外幸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性介绍^[3];一部分学者则考察并检验了中国各种经济因素对人们幸福感的影响^[4-5];还有少数学者尝试构建关于幸福的经济理论模型来研究人们幸福感问题^[6]。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是对实证调查结果进行理论解释,或是在“幸福—收入悖论”框架下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拓展,还没有形成严谨、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也未见从时间维度考察幸福感的研究。为弥补上述缺憾,我们试图基于 Burekhardt 的分析框架,采用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sfaction approach, LSA)来测量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进而考察时间、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

(一)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子

由人们的需求出发,我们可以大致把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子分成三大类:环境因子、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环境因子即指诸如基础设施、公共政策、文化等因子,它们对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在相对较长一段时间内是恒定不变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将这类因子作为外生变量。显性因子即指容易通过货币量化并可在市场上获得的因子,如收入、产品等,但这类因子通常具有边际递减的特点。隐性因子即指无法衡量且不可通过市场获得,但在主观幸福感中又不可忽视的因子,如亲情、健康等。

姜伶俐通过需求分析构造出幸福函数^[7],我们由此函数做出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曲线图,具体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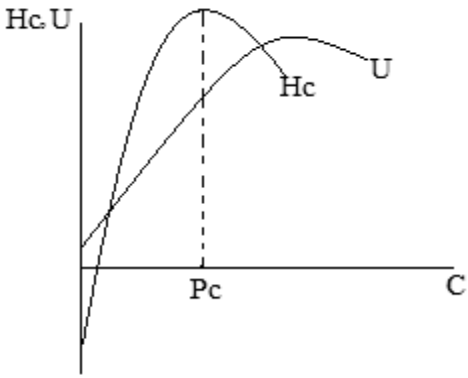


图 1 显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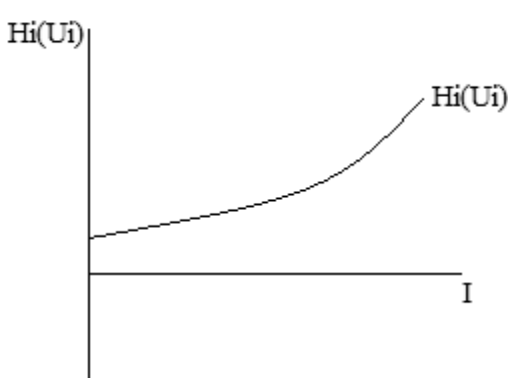


图 2 隐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 H_c 是显性因子 C 的幸福曲线, U 是显性因子 C 的效用曲线。当人们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时,即 C 的数量极少或严重短缺时,人们的幸福感为负,且趋向负无穷,而此时边际幸福感趋于正无穷;由于显性因子具有边际递减的特点,因此随着 C 的增加,当达到 P_c 时,人们的幸福感最大,其后随着 C 的继续增加幸福感将减少;当 H_c 与 U 相交时, C 所产生的幸福感与消费的效用等值,其后 C 的增加将使效用高于幸福感。

由图 2 可知, H_i 是隐性因子 I 的幸福曲线,它明显区别于显性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幸福感随着隐性因子 I 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在人的剩余生命中,通常情况下隐性因子

对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对显性因子和隐性因子的明确感知,所以人们的幸福感将是这两类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 “能力—自由”框架下时间、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

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利用可行能力框架来分析各类因子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可行能力框架中,我们将这些因子归入个体的基本资源,但收入不被视为基本资源,原因是收入是通过时间、资本等衍生出来的资源。

一个人的时间分配到个人护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中将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和选择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对于时间的分配上,人们通常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影响,当然也会与家庭成员的时间、收入共享,同时也会受到文化、社会规范等的影响,所以该框架包含了上述所列举的环境因子、显现因子和隐形因子。时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分析框架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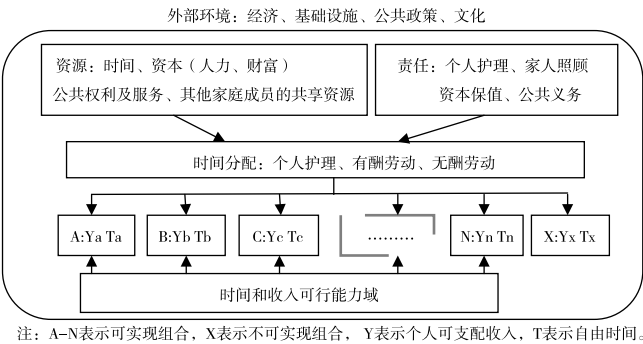


图3 时间、收入与幸福感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 变量界定

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本文研究所需,我们选取了能够反映幸福感、收入和自由时间的相关变量,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主观幸福感评价分值	<i>U</i>	个体主观幸福感通过个体对自身情况的打分(1分最低,5分最高)来进行评价
当月自由时间	<i>t</i>	为了与问卷问题及月收入相匹配,本文将按照法定月计算,工作日为20.92天,休息日为9.08天,由此权重对问卷中休息日与工作日两组不同的自由时间进行加权得到月平均自由时间 <i>t</i>
当月总收入	<i>i</i>	本文的收入指的是个体的总收入,包含工资收入和经营性收入
性别	<i>gender</i>	个体特征向量,用于考察不同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户口类型	<i>qa2</i>	个体特征向量,用于考察现行户籍制度下不同户口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
婚姻状况	<i>qe1</i>	个体特征向量,对婚姻状况进行简化,若调查时个体有配偶或固定伴侣即为已婚,反之为未婚
工作	<i>qg3</i>	个体特征向量,有偿劳动和无偿的家庭帮工均为有工作
年龄	<i>age</i>	个体特征向量,考察不同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自评健康	<i>qp3</i>	个体特征向量,通过个体对自身健康的打分(1分最低,5分最高)来评价
受教育程度	<i>qc1</i>	个体特征向量,对个体受教育程度进行粗略测量,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8个程度
对自己未来的信心	<i>qm404</i>	个体特征向量,考察个体心理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道路硬化程度	<i>roads</i>	村庄特征向量,硬化程度越高,则村庄的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
是否有小学	<i>scho</i>	村庄特征向量,考察基础教育建设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居民死亡率	<i>die</i>	村庄特征向量,通过计算村庄当年居民死亡率来考察其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1. 幸福感。大多数研究者认同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是: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本文所提出的幸福感也是来源于此,即被调查者根据其自身标准对一段时期内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这属于个体主观感受。

2. 收入。在 Easterlin 提出“幸福-收入悖论”这一观点时,他采用人均 GDP 作为测度收入的指标^[8]。之后,大部分研究也都延续这一做法。由于本文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调查对象为微观个体,所

以本文的收入指的是个体的总收入,包含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两大部分。采用该指标的原因是:调查问卷中并无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一项,而且根据实地调查经验,大部分受访者无法准确地分辨个人可支配收入、工资、总收入等概念,所以我们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个人总收入作为收入的衡量指标。

3. 自由时间。本文对自由时间的衡量来源于 Goodin 等和 Burckhardt 对于自由支配时间的界定标准^[1-2]。对于个体来说,自由支配时间即为花于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个人护理所需的最少时间后遗留下来的时间量。

为了得到更为准确的研究结果,我们还加入了两组控制变量:一组是反映个体的特征变量,包括健康、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另一组是反映个体所在社区(村庄)的特征变量,包括社区(村庄)道路硬化情况、社区(村庄)是否有小学、居民死亡率。

(二) 研究方法

Burckhardt 对“能力-自由”框架进行了扩展,他认为自由时间与收入可以相互转换。他指出,由于各人的特点不同,因此给定的投入(如空闲时间或时薪)可以转化为有价值成果(实现个人目标)的速率各不相同。1 小时的时间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可以转化为一个大的消费机会,而对于那些低收入者来讲则意味着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消费机会。这种转换是基于可行能力理论而进行的^[2]。本文的研究基于 Burckhardt 的思路,利用生活满意度法来估计自由时间的货币价值,进而测度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我们假设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函数为式(1):

$$U_i = F(T_i, I_i, X_i) \quad (1)$$

在式(1)中, U_i 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 T_i 为个体的自由时间, I_i 为个体的收入, X_i 为一组个体的特征向量。

为了度量自由的货币价值,我们对决定函数进行了简化,得到式(2):

$$U = F(T, I) \quad (2)$$

我们对式(2)进行全微分得到式(3):

$$dU = \frac{\partial U}{\partial T} dT + \frac{\partial U}{\partial I} dI = 0 \quad (3)$$

在式(3)中,我们保持 dU 为 0,并将 T 与 I 的变化相互替代得到式(4):

$$MRS = -\frac{dI}{dT} = \frac{\partial U}{\partial T} / \frac{\partial U}{\partial I} \quad (4)$$

式(4)中的 $\frac{\partial U}{\partial T} / \frac{\partial U}{\partial I}$ 即可表示为自由的边际价值。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用效用近似地代替幸福感,为了便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我们也沿用这一假设,即自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是边际递减的,收入的效用也是边际递减的,所以我们对自由和收入分别取自然对数,并假定主观幸福感决定函数的具体形式如式(5)所示:

$$U = a_0 + a_1 \ln T_i + a_2 \ln I_i + a_j X_i \quad (5)$$

在式(5)中,因为 $MRS = -\frac{\partial \ln I_i}{\partial \ln T_i} \times \frac{I_i}{T_i}$,且有 $MRS = \frac{a_1}{a_2} \times \frac{I_i}{T_i}$,所以当个体时间自由变化一个单位

时,个体收入变化 $\frac{a_1}{a_2}$ 个单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设定本文用于实证检验的模型如式(6)所示:

$$U = a_0 + a_1 \ln T_i + a_2 \ln I_i + a_j X_i + \varepsilon_i \quad (6)$$

在式(6)中, U_i 为个体自我报告的主观幸福感, T_i 为个体的自由时间, I_i 为个体月总收入的自然对数, X_i 表示一组个体和其他微观水平的特征向量, ε 为误差项。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 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全国基线调查。因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 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所以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 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其中, 个体主观幸福感通过主体报告的 5 分制得分获得。本文的自由采用时间自由来衡量, 数据来自上述调查的时间模块, 时间自由函数则采用 Burckhardt 对于时间掌控程度的函数 $T = 24 - W - R - P_1 - J_1$, 其中 W 为个人卫生活动, R 为照顾家人和家务活动, P_1 为个人工作, J_1 为交通活动^[2]。此外, 根据“能力-自由”分析框架的拓展, 各项因子对幸福感的影响均可通过时间分配来显示, 那么时间自由即可由总时间减去花在有偿劳动、无偿劳动和个人护理所需的最少时间后遗留下来的时间量来表示。

四、实证检验

(一)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我们采用 Pearson 方法估算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

	<i>U</i>	<i>lnt</i>	<i>lni</i>	<i>age</i>	<i>qp3</i>	<i>qa2</i>	<i>qe1</i>	<i>qm404</i>	<i>gender</i>	<i>qg3</i>	<i>roads</i>	<i>scho</i>	<i>die</i>
<i>U</i>	1.0000												
<i>lnt</i>	0.0716	1.0000											
<i>lni</i>	0.1272	-0.0269	1.0000										
<i>age</i>	0.0044	0.3402	-0.1852	1.0000									
<i>qp3</i>	-0.1888	0.1179	-0.1584	0.2863	1.0000								
<i>qa2</i>	0.0919	0.2169	0.2406	0.1837	0.0459	1.0000							
<i>qe1</i>	-0.0521	0.1345	-0.1273	0.4298	0.1404	0.0615	1.0000						
<i>qm404</i>	0.3781	-0.0357	0.1214	-0.1724	-0.2062	-0.0633	-0.0906	1.0000					
<i>gender</i>	-0.0229	0.0640	0.1795	0.0142	-0.0837	-0.0793	-0.1186	0.0401	1.0000				
<i>qg3</i>	-0.0022	-0.4325	0.1630	-0.4744	-0.1861	-0.1831	-0.2089	0.0946	0.0972	1.0000			
<i>roads</i>	-0.0159	-0.0143	-0.0190	-0.0076	-0.0198	-0.0452	-0.0058	-0.0156	0.0127	-0.0043	1.0000		
<i>scho</i>	-0.0604	-0.0451	-0.0683	-0.0648	-0.0106	-0.1123	-0.0430	0.0000	0.0278	0.0104	0.0199	1.0000	
<i>die</i>	0.0135	-0.0127	-0.0128	-0.0133	-0.0033	-0.0636	-0.0024	0.0221	0.0076	0.0156	-0.0029	0.0467	1.0000

由表 2 可知,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处于 (-0.5, 0.5) 这一区间, 说明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此外, 表 3 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

(二) 回归分析

表 4 是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在表 4 中, 我们把样本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视作基数, 在模型一中没有加入其他任何控制变量, 只对样本主观幸福感和自由时间、总收入进行回归; 在模型二中加入了样本个体的一组特征变量进行回归; 在模型三中继续加入了样本个体所在村庄的一组特征变量进行回归。

从表 4 中模型一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在没有加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自由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由模型二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 在加入个体的一组特征变量后, 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仍然呈正相关关系, 并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但自由时

表 3 方差膨胀因子检验

<i>Variable</i>	<i>VIF</i>	<i>1/VIF</i>
<i>age</i>	1.7100	0.5858
<i>qg3</i>	1.5000	0.6667
<i>lnt</i>	1.3100	0.7614
<i>qe1</i>	1.2500	0.7982
<i>lni</i>	1.2200	0.8198
<i>qa2</i>	1.2100	0.8264
<i>qp3</i>	1.1400	0.8773
<i>gender</i>	1.1100	0.9045
<i>qm404</i>	1.0700	0.9328
<i>scho</i>	1.0200	0.9777
<i>die</i>	1.0100	0.9939
<i>roads</i>	1.0000	0.9964
Mean VIF	1.2100	

间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却呈现负相关关系且不显著。从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自由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表 4 全样本估计结果——OLS 模型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系数	t 值	p 值
<i>lnt</i>	0.2323	14.71	0.0000	-0.0070	-0.44	0.6630	0.3189	9.25	0.0000
<i>lni</i>	0.0994	25.76	0.0000	0.0446	11.63	0.0000	0.0541	6.57	0.0000
<i>cons</i>	-1.4918	-14.80	0.0000	0.1694	1.66	0.0960	0.2019	0.92	0.3580
<i>age</i>				0.0022	7.92	0.0000	0.0057	9.42	0.0000
<i>qp3</i>				-0.0209	-5.32	0.0000	-0.1587	-18.78	0.0000
<i>qa2</i>				0.4013	50.52	0.0000	0.1031	6.02	0.0000
<i>qc1</i>				0.0375	12.32	0.0000	0.0303	4.64	0.0000
<i>qe1</i>				-0.0103	-1.1	0.2700	-0.1907	9.49	0.0000
<i>qm404</i>				-0.0262	-8.37	0.0000	0.3281	48.83	0.0000
<i>gender</i>				-0.0940	-13.63	0.0000	-0.1325	-8.94	0.0000
<i>qg3</i>				-0.0204	-2.44	0.0150	0.0172	0.95	0.3400
<i>roads</i>							-0.0144	-0.81	0.4180
<i>scho</i>							-0.0797	-5.59	0.0000
<i>die</i>							0.5554	2.10	0.0360
R-squared		0.0512			0.2776			0.1942	
F 值		429.96			611.57			295.04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由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我们把主观幸福感水平为 1 和 2 的视为不幸福,赋值为 0,把主观幸福感水平为 3 至 5 的视为幸福,赋值为 1,采取二值 Probit 模型(Binary Probit Model)探讨自由时间、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第二,把家庭主观幸福感视为有序变量,采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研究自由时间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5 和表 6 报告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 5 全样本估计结果——二值 Probit 模型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P 值	边际效应
<i>lnt</i>	0.4189	0.0528	0.0000	0.1455
<i>lni</i>	0.1013	0.0126	0.0000	0.0352
<i>age</i>	0.0101	0.0009	0.0000	0.0035
<i>qp3</i>	-0.1961	0.0131	0.0000	-0.0682
<i>qa2</i>	0.1566	0.0240	0.0000	0.0542
<i>qe1</i>	-0.0879	0.0159	0.0000	-0.0305
<i>qm404</i>	0.3793	0.0108	0.0000	0.1318
<i>gender</i>	-0.1723	0.0234	0.0000	-0.0594
<i>qg3</i>	0.0633	0.0276	0.0220	0.0221
<i>roads</i>	-0.0715	0.0277	0.0100	-0.0248
<i>scho</i>	-0.1083	0.0222	0.0000	-0.0375
<i>die</i>	0.8012	0.4648	0.0850	0.2784
<i>cons</i>	-4.0056	0.3376	0.0000	
Pseudo R ²	0.1102			

表 6 全样本估计结果——有序 Probit 模型

变量	系数	稳健标准误	P 值	边际效应
<i>lnt</i>	0.3189	0.0437	0.0000	0.0093
<i>lni</i>	0.0798	0.0099	0.0000	-0.0023
<i>age</i>	0.0096	0.0008	0.0000	-0.0003
<i>qp3</i>	-0.1847	0.0115	0.0000	0.0054
<i>qa2</i>	0.1664	0.0191	0.0000	-0.0048
<i>qe1</i>	-0.0872	0.0136	0.0000	0.0026
<i>qm404</i>	0.4077	0.0101	0.0000	-0.0119
<i>gender</i>	-0.1685	0.0187	0.0000	0.0048
<i>qg3</i>	0.0310	0.0231	0.1780	-0.0009
<i>roads</i>	-0.0145	0.0221	0.5110	0.0004
<i>scho</i>	-0.1005	0.0176	0.0000	0.0029
<i>die</i>	0.7533	0.3539	0.0330	-0.0221
Pseudo R ²	0.0798			

由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线性回归模型(OLS)估计出的结果和有序概率模型估计出的结果相比,除了回归系数值有所不同外,显著性和系数的符号具有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从二值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中也可以看出,自由时间、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自由时间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结论是稳健的。

(四) 归纳讨论

1. 自由时间、收入、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根据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对自由时间、收入、反映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反映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讨论如下:

第一,由模型三可知,自由时间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3189,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自由时间每增加1%,主观幸福感增加0.3189%。在有序probit模型中,自由时间在均值处的边际效用为0.0093,说明自由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发生概率将增加0.0093。

第二,由模型三可知,个体月收入的自然对数的系数为0.054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个体月收入每增加1%,主观幸福感增加0.0541%。在有序probit模型中,个体月收入在均值处的边际效用为-0.0023,说明个体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增加的发生概率将减小0.0023。该结果与Kahneman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收入的增加虽然会增加主观幸福感,但具有边际递减的特点^[9-10]。

第三,在反映个体特征的控制变量中,年龄、城镇户口、对未来的信心、受教育水平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性别、婚姻、自评健康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相比于女性,男性表现出来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女性通常容易寻找到一个较低的参照标准,从而表现出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第四,在反映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死亡率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有小学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道路硬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则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我们通常的经验相违背。国际上普遍认为较高的预期寿命也表现出较高的发病率和残障率,因此在村庄建设良莠不一、临终关怀缺失的情况下,上述因素可能会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2. 自由时间的价值估计

由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可知,为了保持主观幸福感不变,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从有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中时间自由的自然对数和月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系数可知,为了保持主观幸福感不变,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月总收入增加4.74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由此可以看出,无论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还是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我们均可得出时间自由的增加显著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生活满意度法对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进行量化,同时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经验分析,探讨时间自由、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第一,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第二,通过OLS估计结果发现,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

根据本文所得结论,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注重调节收入再分配,关注低收入人群。本文的计量结果表明,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但与此同时收入也具有边际幸福感递减的特点且这一特点已初步显现,这表明增加等量收入带来的主观幸福感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增加幅度不同。因此,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避免“一刀切”的情况出现,政府应尽可能地优化财政支出和税收结构,在收入再分配中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整体的主观幸福感。同时,对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则应该在公共医疗、教育公平、环境保护等领域予以切实地改善,以使这些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受到较大提高。

第二,完善制度保障,推进创新活动。由计量结果可知,时间自由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应加强创新力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将有利于节约劳动时间,增加个体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从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而营造一个宽松的创新环境需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降低创业门槛,破除阻碍创新的制度。

第三,优化财政结构,强化社会保障。虽然我国的整体财政收支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但其结构却与“幸福社会”尚不匹配。目前我国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支出依然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而这些支出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息息相关。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一方面,要让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从繁复的生活压力中脱离出来,以增加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和提升有助于形成健康良好的社会氛围,缩小个体幸福感差距,最终提升全民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GOODIN R E, JAMES M R, ANTTI P, et al. Discretionary time: a new measure of freedo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1 - 53.
- [2] BURCHARDT T. Time, income and substantive freedom: a capability approach[J]. Time & Society, 2010, 19: 318 - 344.
- [3] 齐书良. 关于时间利用的经济学研究综述[J]. 经济学动态, 2012(2): 116 - 121.
- [4] 陈前恒, 林海, 吕之望. 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 ——基于中国中西部 120 个贫困村 1800 个家庭的调查[J]. 经济学(季刊), 2014(1): 723 - 743.
- [5] 罗楚亮.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J]. 经济学(季刊), 2006(3): 817 - 840.
- [6] 邢占军. 测量幸福: 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69 - 87.
- [7] 娄伶俐.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证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9.
- [8] EASTERLIN R.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27: 35 - 47.
- [9] KAHNEMAN D, DEATON D. High income improves evaluation of life but not emotional well-being[C]. Center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
- [10] 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et al. Would you be happier if you were richer? A focusing illusion [R]. CEPS Working Paper No. 125, 2006.

[责任编辑:王丽爱]

Free Time, Income and Sense of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XU Junwu¹, WU Weijie²

- (1. School of Busines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 2. Th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 Union of Anxi County, Anxi 3624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ime, income and sense of happiness 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this paper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ree time, income and individual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stimates the value of money in time freedom by means of life satisfaction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ime freedom and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dividual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 for all families. The happiness induced by income increasing 5.89% is equivalent to the happiness induced by time freedom increasing 1% per month. Its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ultimat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ed-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improving income, but also increase the free time to enhance people's sense of happiness through reform.

Key Words: free time; income distribution; individual subjective well being; public expenditure; financial structure; social security; individual sense of happiness; life satisfaction